

孔子,又称孔夫子。中国春秋末期思想家、政治理论家、教育家、儒家创始人。世界文化史上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。名丘,字仲尼,鲁国陬邑(今山东曲阜东南)人。据称,孔子弟子三千,贤者七十二人,其学术影响之大可想而知。在政治上主张“正名”,即“名不正则言不顺,言不顺则事不成”,今已成为格言;政治理论上宣传“仁”,孔子于“仁”的定义解释颇多,核心应该就是“克己复礼”,大意即克制私欲,遵守礼制,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“守纪律,讲规矩”。

早在鲁哀公时代,就在孔子的家乡建立纪念和祭祀孔子的孔庙,唐贞观年间,下诏各州、县皆立孔庙,以后,中国县以上的行政区均建有孔庙,它既是纪念和祭祀孔子的场所,也是一个地方的学府,即地方的教育和教育主管机构,于是,孔庙又称孔夫子庙、夫子庙、学宫、县(府)学、文庙等名,如南京称夫子庙,嘉定称孔庙,上海称文庙等。中国的许多文庙历年均遭破坏,保存完整者屈指可数,而上述三者是保存较完整者,如何保护文庙建筑,发扬新时代的儒学精神,这可能就是我们这一时代面临的新课题。

①从梓潼祠到上海县学

科举考试是国家选拔官吏、有用之材的手段,也是读书人踏上仕途的必由之路,所以,古代的行政区大多设有“儒学”,相当于今日的教育局。据记载,南宋末,上海人唐时措、时拱昆仲购民宅建文昌宫,是上海有“镇学”之始,元至元二十九年(1292年)升上海镇为上海县,于是“镇学”也改称“县学”。

据《史记》中记,星空中的斗星主宰人的读书、功名、命运等,与读书人的命运息息相关,于是斗星也被人们尊为“文昌星”,也就是民间所谓的“文曲星”。梓潼神也是古代的文曲星。梓潼是汉朝设置的一个县,在今四川绵阳一带,据宋人《事物纪原》中讲,晋朝时梓潼人张恶子在战争中阵亡,当地人就为他建了一座庙,人们称他为“梓潼神”,唐明皇出征巴蜀时,梓潼神显灵,被迫封为左丞相,唐僖宗时又加封齐顺王,北宋咸平年间,四川发生兵变,他又显灵平息军变,又加封英显王。也不知什么原因,这位神灵在北宋时就与“文昌帝君”混为一谈,成了“文化人”的保佑神,许多地方建有“梓潼祠”或“英显王庙”,如《明史·礼志四》:“梓潼帝君者,记云:神姓张,名恶子,居蜀七曲山。仕晋,战歿,人立为庙。唐末屡封,至英显王。道家谓,帝命梓潼掌文昌府事及人间禄籍,故元加号为帝君。”可见,宋上海镇学是建在文昌宫或梓潼祠内的。

元朝是少数的蒙古族统治多数的汉民,建国之初,元王朝对汉民实行高压的政策,当政权巩固后,统治者就采取以汉民治汉民的政策,推崇儒学,使孔子的地位继续上升,当元成祖继位后,“首下崇儒之诏”,全国掀起兴建或重建文庙之风,上海则由主管盐业的富绅费拱辰出资,在原梓潼祠的基础上,“乃饰正殿,完讲堂,起斋舍”,“沉沉翼翼,如至邹鲁之间,游洙泗之上”,它的规制模仿曲阜的孔庙,以大殿为正殿,已经不再是梓潼祠,而是孔子庙,元人写的《上海县学记碑》中提到:“尝像圣先师于祠堂”,在大殿里悬挂有孔子的画像。

明《弘治上海县志》中记,文庙“在县治东一百二十步”,所谓“县治”就是县衙门,上海建县后,县衙门长期固定在一个位置,没有搬迁。今天的上海旧城里有一条叫“学院街”的路,它的旧名就叫“县前街”,它的北面则有一条“县后街”,都是以县衙门前和后得名的,这样就可以确定当时上海县治的位置,同样也能确定文庙的位置,它在今学院路的北面,四牌楼路的东面。

上海文庙故事多

◆薛理勇

②文庙和丁祭

《礼记·王制》:“大学在郊,天子曰辟雍,诸侯曰頖宫”。“辟”同“璧”,是一种环状中间有穿孔的玉,古代是祭天的礼器,“雍”同“醴”,指水泽。该句的大意讲,大学设在郊外,天子,即中央政府的大学四面设有环状的围墙,并有水环绕,所以叫“辟雍”;诸侯,即地方政府的学校也是如此,但不能完全模仿中央政府,只有一半的环状围墙和水,所以叫“頖宫”,上海只是一个县城,规格更低,只是在学校里挖一小沟,象征性地架几座“环龙桥”而已。

既然有了孔庙,就会有祭孔活动,迟至在宋代,祭孔活动固定在每年仲春和仲秋的第一个“丁”日举行,称之“丁祭”,其中又以秋曰“丁祭”更隆重。据《明史·礼四》中讲:朱元璋登基后就立即派使者到曲阜孔庙祭孔,并说:“仲尼之道,广大悠久,与天地并,有天下者莫不虔修祀事。朕为天下主,期大明教化以行先圣之道,今既释奠成均,仍遣礼修事于阙里(即孔子的故乡),尔具敬之。”从此以后丁祭成为制度,“定每岁仲春、秋上丁,皇帝降香,遣官祀于国学,以丞相初献,翰林、学士亚献,国子祭酒终献”。上有所好,下必尤甚,在中央政府的推动下,全国祭孔蔚然成风,并形成制度。

祭孔有固定的制度,中央的祭孔仪式上使用“乐生”60人,“舞生”48人,共计108人,实际上在读书人中找不到那么多的能歌善舞的人,只能从京师的戏班或百姓中挑选,但“太祖曰:乐舞乃学者事,况释典所以崇师,宜择国子生及公卿子弟在学者,豫教肄之”。上海是县城,仍规定丁祭时使用“乐生”48人,“舞生”36人,在读书人中找不出那么多的“乐生”“舞生”,那只能出钱雇用戏班子的“小堂名”,反正天高皇帝远,皇帝也顾不上那么多的事。



■上海文庙崇圣祠



■文庙旧址地图



■清代上海文庙奎星阁



■清代嘉定汇龙潭奎星阁

③崇圣祠和奎星阁

唐开元二十七年(739年)追谥孔子为“文宣王”,宋元时又在文宣王上加封“玄圣”“至圣”“大成至圣”等,所以,孔庙的正殿一律叫做“大成殿”,元代,大成殿里可以挂孔子画像,明初就为大成殿是否能挂孔子画像发生争论,有人认为,孔子是圣人,他不是神,但很神圣,不宜有具体形象,实际上中国的肖像画水平太差,画或塑得不好的孔子像,反而歪曲、扭曲了孔子形象,于是经朱元璋拍板决定,从今以后不再挂孔子的画像或塑像,一律使用牌位,上书“至圣先师孔子”,此后,全国的孔庙只供孔子牌位,不挂或塑孔子像。《明史》还记录,嘉靖九年(1530年),大学士张璁提出,历代对孔子的祭祀没有不妥之处,就是孔子父亲叔梁纥的牌位作为“附祀”放在孔子边上,而孔子倡导的“正名”就是强调“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”的人伦,把孔子父亲牌位作为“配享”放在孔子边上,即使圣人,其心也不安,于是就在大成殿后加建“崇圣祠”,专供孔子的上五代祖先,他们是:肇圣王木金父公、裕圣王祈父公、诒圣王防叔公、昌圣王伯夏公、启圣王叔梁公。

孔子在政界、学界有至高无上的地位,于是道教也收罗孔子为神,当然,在孔子之前,读书人也尊文昌神、梓潼神为“文曲星”,孔庙里也有他们的祠,明朝又规定“禁天下祀孔子于释老宫”,就是任何道观内不得供孔子为神,孔庙里也不供其他的神。不过有一例外,就是“魁星阁”或“奎星阁”。按《说文解字》:“奎,两髀之间。”“奎”字相当于“胯”,指人两大腿的位置,或两腿。古人把在地球上能望见的星星划分成二十八宿,并根据其形状取名,二十八宿中的西方白虎七宿的第一宿有16颗星,构成个形似“奎”的形状,叫“奎宿”,也有人认为“奎星屈曲相勾,似文字之画”,于是“奎主文章”,就是主宰文人的命运。人们想为奎星拟人化地画一个像,但怎么也想不出该画成什么样,因为“奎”同“魁”,人们就根据“魁”字的结构和字形,把奎星或魁星画成一个小鬼屈起一足,踢一只斗。《同治上海县志》:“奎星阁,在旧学尊经阁东南隅巽方,有神像。雍正十年(1732年)巡道王澄慧建。”据记载,奎星阁建成后12年,上海有多人考取举人、进士,于是上奎星阁顶礼膜拜的人越来越多。



■1907年上海文庙大成殿



■上海文庙棧星門

④文庙迁西门内重建

清咸丰三年八月初五(1853年9月7日)是丁祭的日子,署理上海知县袁祖德率领上海的文武官员在文庙丁祭,就在此时,小刀会发动起义,攻占上海县衙门,袁祖德立即返回衙门,试图劝义军放下屠刀,立地成佛,不料当场被义军一刀捅死,成了刀下冤鬼。广东帮义军刘丽川即以文庙作为自己的指挥部。1855年初,在租界当局配合下,清军全面进攻、镇压小刀会,文庙建筑毁于一旦。一个县城没文庙不行,战后上海即开始在原址重建文庙,不料工程刚开始就遇上火灾,刚搭的架子全部烧毁,于是许多文化人惶恐不安,认为文庙旧址已遭血光之灾,文庙应迁新址重建,最终决定“移学于西城右营署基”重建。于是原来的文庙地方被叫做“旧学”或“旧文庙”,现在学院路还有一条叫“聚奎街”的小路,这是旧文庙奎星阁留下的地名。在西门重建的文庙就是“新文庙”,“西城右营”的全名是“提标右营游击署”,是清代上海一个军事机构的营地,在明朝,这里又是在上海的“海防道”,是为抗击倭寇而设立的军事机构,今文庙西侧有条叫“老道前街”的小路,就是以那个老的海防道而得名的,据记载,明朝的海防道营地在东面和北面各建有瞭望楼,北面的楼俗称“望北楼”,而沪方言中“望”与“梦”同音,均念如 máng,“北”与“花”在沪方言中有些相近,于是“望北”被讹作“梦花”,而“梦花”义同妙笔生花,人们又误以为今文庙北门外的“梦花街”是以文庙而得名的。

西门内的文庙基本上参照旧文庙样式重建,其西块是纪念和祭祀孔子的孔庙,最南面就棧星门,入门为泮池,池上有三座小的环龙桥,跨过泮池是大成门,有甬道直通大成殿,大成殿的后面就是崇圣阁,其东面的那块就是教谕署,相当于今日的教育局。

1860年太平军东进期间,清廷招募的外国雇佣军——洋枪队不能驻扎租界,全驻扎上海老城厢,文庙成了洋枪队的营地,好在这座文庙新建不久,破坏不算严重,战争结束后就复原。1904年,慈禧太后下懿旨,废除科举制度,文庙的地位到了“夕阳无限好,只是近黄昏”的境地。

1932年,上海文庙旧址改建为上海市立民众教育馆对社会开放。



上海文庙明伦堂